

V740.7

富裕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富裕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

目

录

一、回忆我们的李政委

——纪念李舒同志逝世三十周年……………郭良甫（1）

二、遗腹女千里寻父记

——兼忆我们的周县长……………郭良甫（5）

三、伪满兴农合作社与粮谷出荷……………郑化宇（11）

四、富裕县历史沿革……………县志办（16）

五、缉拿匪首邹海楼……………安凤瑞 傅吉本（20）

六、匪首孟庆武的罪行……………安凤瑞（25）

七、末任伪县长张文焕在富裕的前前后后……………傅吉本（31）

八、杨贵棠轶事……………姜 黎（37）

九、登子科村调查……………吴兰 姜黎（41）

十、乌裕尔河畔的喇嘛庙……………敖乐奇（47）

十一、清代站丁姜纯墓……………郑化宇（55）

回忆我们的李政委

——纪念李舒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郭良甫

李舒同志是富裕县第一任县委负责人。原名李铮，辽宁省新民县人。“九·一八”后，他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同学流亡关内，先在河北保定满城县书店当学徒。1934年入北平东北中山中学学习，1935年—1936年参加北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队员，并且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学生爱国运动。1937年10月间，随平津流亡学生赴山西、河南等地做抗战动员工作，而后留在汤恩伯部战地服务团工作半年。1938年7月入延安抗大学习（第五期），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末转为正式党员。1939年10月在鲁西军区政治部任宣传干事、统战干事。1941年11月至1943年12月任山东省鄄城、梁山县区委书记，1943年12月任冀鲁豫两地党校教育委员，1945年9月来东北，参加过四平保卫战①。1946年5月由地委派往富裕县任县委副书记，后任县委书记。

1949年7月调安达县任县委书记，后又调东北局组织部任科长、呼兰县委书记、哈尔滨电机厂党委副书记。因患白血病，1955年3月23日逝世于北京中苏友好医院，终年36岁。

从1946年12月至1949年7月，我一直在李舒同志领导下工作。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李舒同志是我启蒙的老师，尊敬的领导，是我学习的楷模，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李舒同志勤奋好学，善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他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可是他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无论在机关或下乡工作，他都很早起床看书学习、晚上也是学习到很晚才休息。当时理论书籍很少，他每次到地委开会回来，总是带回几本书，除自己学习外，还组织县委机关的同志学习，并经常参加我们的学习讨论会，随时讲解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我记忆最深的是领导我们学习了毛泽东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论联合政府》和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他赠给我一本“七大”制定的党章，我一直珍贵的保存着。他对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也十分认真，如一九四六年中央发的“五四”指示，1947年发表的《土地法大纲》和任弼时同志“关于农村划分阶级的几个问题”。这是指导土改的基本文件。他曾领导我们多次学习，并带领我们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记得那次调查了十多个村屯，按照中央文件精神，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农村划分阶级，计算剥削率的具体方法和如何贯彻“依靠雇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击地主”的土改路线（也是当时农村工作路线）。然后召开全县区、村干部会议，李舒同志亲自讲解上述文件，那次会议对富裕县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李舒同志作风朴素，善于密切联系群众。李舒同志身材魁梧、身高1.8米以上，从外观看好象很严肃，其实他是对同志非常热心的人。他不吸烟、不喝酒，除按规定吃小灶饭

外，衣着穿戴同一般干部一样。他同我们在一起，从衣着上看谁也分不出他是县委书记。记得有一次李舒同志领我们到一个村工作，外村的一位老农民听说这里有县委书记，就来找县委书记告状。看见这些人穿的都一样，不像有“大官”的样子，后来看见警卫员穿的很整齐，挎着盒子枪，认为他是县委书记，拉住警卫员不放，非要向他告状，给他解决问题。1947年冬，正是土改运动高潮，李舒同志整个冬天都蹲在农村领导土改运动。那年雪很大，天气特别冷，冬鞋发的靰鞡，他不会穿，我们要给他换双大头靴子，他不同意，宁肯同我们一样絮靰鞡草穿靰鞡。为了取得土改运动第一手材料，他经常蹲在三区新民村，总结出怎样建立贫农团，发动群众搞土改和注意阶级分析，贯彻土改政策等经验，指导全县的土改运动。1948年河南四个区遭受严重的内涝，大片土地变成一片汪洋，许多村屯被水包围，有些房屋被水泡塌了，给人民的生活、生产造成极大的困难。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政府无力救济，只有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李舒同志带领我们到灾情最重，距县城最远的五区九岗子村，发动群众搞生产自救。那一带遍地是泥浆，不但车不能行，骑马也经常被陷在泥里出不来，只好趟着没膝深的泥水，一个屯一个屯、一户一户的跋涉前进，他这种关心群众疾苦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李舒同志立场坚定，英勇果敢，是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他刚到富裕时，工商会长许会拎着一兜子钱到李舒家送礼，一进门就说：李政委，大家让我给你送点钱买双鞋穿。李舒一听就火了，把许臭骂一顿灰溜溜地拎着钱走了。

1946年秋，李舒同志带30多名保安队员和十多名土改工作队员到李粉坊村搞土改。地主怕的要命，暗地勾结土匪文军等纠集七、八十土匪，企图杀害李舒，消灭土改工作队，破坏土改运动。由于李舒同志机智果断，一方面派出公安队攻打土匪住地，另一方面带领工作队转移出去，才免遭被害。1947年秋，机要通讯员送来西满军区紧急动员令，要富裕县在三天内出动12辆马车，150名担架队员，携带担架30副，支援解放战争。李舒同志连夜召集县委和有关人员会议，分配任务，并亲自给各区委书记打电话，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虽然时间短，任务艰巨，可是按时完成了任务。

李舒同志党性很强，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县委机关凡是开党支部或小组会，只要李舒同志在家，都按时参加。他对同志要求很严，发现那个同志有缺点、毛病，能一针见血的指出来。李舒同志对自己要求更严，一旦发现自己的缺点，能立即检查改正。记得在1947年冬天，省委派工作组到富裕县检查土改工作，李舒同志与工作组长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甚至向省委告工作组的状。后来李舒同志发现自己错了，向省委作了检讨，改正了自己的缺点。李舒同志思想开朗，性情豪爽，有时研究问题争论得脸红脖子粗的，直到把问题弄清楚才算了事。他喜欢唱国际歌，凡开大型会议，大家都欢迎他唱歌，他声音高亢洪亮，震宇绕梁，听了使人精神振奋，勇气倍增。现在回忆起来，好象耳边还听到他那嘹亮的歌声。

注：①为编者所加

遺腹女千里寻父记

——兼忆我们的周县长

郭良甫

去年国庆节，几位老友凑在一起，酒桌上谈起写县志的事，大家历数富裕县领导班子解放以来变化情况，当谈到已故县长周建农时，使我记起一件不平凡的往事。

1975年8月，虽然雨季将要过去了，可是天空还是阴多晴少乌云不时遮住太阳，阵雨淅沥地下着，使人们的心情沉闷不安。我正在办公，电话铃突然响了，我拿起话筒，是位女同志的声音：“您是郭同志吗？我是从外地来的，有件事情想打听一下，请您帮助……，我们住在湖滨招待所204号房间。”我放下话筒，马上奔湖滨招待所，找到204号房间，轻轻地敲敲门，听里边说“请进”。我推门进到屋里，见室内有三个人，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和年近花甲的老太太，还有个五、六岁的男孩。当我说出自己的姓名后，他们热情地让坐、倒水，我们开始谈了起来。

原来那位年轻的女同志叫梅燕（我记得是这个名字），在北京某部门做翻译，那位老太太是她的姑妈，也在中央某部门工作，那个小男孩是梅燕的独生子彬彬。他们是昨天从

富裕县来到齐市的，是找我了解一九四八年富裕县的县长周建农的情况。因为她们在富裕县找到一些老同志，都说：“听说有位周县长死了，名字叫周建农。”可是问到那位县长的长像、特征时，都说没见过，所以也说不清楚。至于是什么时间、什么病死的，埋葬在哪里，更说不清楚了。因为在阶级斗争特别激烈的当时，有些同志因工作关系，经常更换姓名，所以既不知道面貌特征，又不了解他的档案关系，对这个人究竟是谁，就很难说清楚了。

我当时是县委秘书，和县委领导同志接触的较多，我还管理党内文件和区委以上干部的档案材料，所以对这方面的情况知道的多些。我介绍说：“周建农同志是一九四八年一月间从讷河县调到富裕县任县长的，虽然他在富裕县工作的时间不长，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他中等身材，圆型脸，肤色微黑，大眼睛，说话是安徽口音，左眉稍上有颗米粒大的黑痣……。”我说到这里，见那位老太太连连点头说：“是他，是他。”接着她问我：“您看他当时有多大年纪？”我说：“从外貌看好像三十五、六岁了，可是从他填写的干部登记表上，那年是三十一岁。他姓梅，曾用名周文彬，现名周建农，是安徽省人。”我说到这里，见到老太太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泣不成声的对她侄女说：“燕燕，是你爸爸，是你爸爸。”接着她向我们介绍说：“周建农是我亲哥哥，在延安时叫周文彬，到东北后再没通过信，改为周建农的名字我们不知道。我们原籍是安徽省安徽市郊区周庄，家中有老母、兄嫂和我共四口人。靠种几亩山地维持生活，母亲是地下党员，我和哥哥在母亲影响下做些秘密的交通工

作。一九四一年日寇侵占了大半个中国，我们那里也成了敌占区。母亲托人将我们兄妹带往根据地，当时哥哥只有二十三岁，与嫂嫂结婚不到一年，嫂嫂已身怀有孕，为了革命事业，我们只好与老母、嫂嫂分别了。在我们走后第二年，嫂嫂生了个女孩，取名燕燕，含意延安的意思，这个女孩就是梅燕。到一九四四年嫂嫂病逝了，只有老母幼女二人渡日，生活十分艰难，多亏地下党组织的关怀和群众接济，才熬到解放。在一九五〇年我回乡探望母亲时，将燕燕带到我身边抚养。我劝说老母到我那去，她不同意，说在城里不习惯，又舍不得离开那个家。我同哥哥是一九四五年从延安分手，我分配到华北地区，他分配到东北地区工作，以后就再无音信。老母见我平安地回来了，虽然未见到哥哥她还是放心的，认为战争结束以后，她儿子会回来的。以后每年我和燕燕去探望她老人家，她都向我们打听哥哥，我只好说哥哥离这太远，工作又忙，暂时回不来，他一定会回来看你的。母亲说：“你哥哥怎么不来信呢？”我只好说：“我们经常通信，这里不方便所以没给你写信。”甚至有时我只得编出一封哥哥的信，念给她听。”梅燕接着说：“我姑妈的这些做法，只能骗过年过八旬的老祖母，可对我却越来越不灵了。在我记事的时候起，见到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我就问祖母，我爸爸妈妈呢？祖母告诉我：妈妈死了，爸爸到姥姥家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想念爸爸的心情愈发强烈了，我经常问姑妈——爸爸长的什么样？他个高吗？他也戴眼镜吗？……。在我参加工作以后，姑妈才告诉我：在一九五〇年听到一个口信说，爸爸在东北牺牲了，我就下定决心，非找到爸爸不可，就是真

的死了，也得找到坟头上痛哭一场。十几年来我每次外出开会，逢人就打听爸爸的消息，有一次我去辽宁省工作，打听到有五位姓周的老同志，我逐个拜访，可是他们中有两个是山西人，一位是河南人，另两人是辽宁本地人。去年我到南方几省去工作，听说在一九四九年从东北调大批干部到南方去工作，我想我爸爸是否被调到南方去了呢？我走到一处，问一处，始终没有爸爸的消息，可我并没有灰心，我总想爸爸死的口信不实，爸爸还活着，在什么地方工作呢。有一天我能看见爸爸的面容，叫声爸爸，那该多么高兴啊！可是这个时刻一直没有到来。突然接到姑妈从东北某干校的来信，说她了解到了爸爸的消息，我心里非常高兴，马上向领导请准了假，买好火车票，带领彬彬赶到姑妈那里。姑妈对我说：有位同志说土改时你爸爸在扶余县工作过。次日我们乘火车找到扶余县，一打听都说没听说有这么个人，我们很失望。有人提醒说，是不是在黑龙江省富裕县呢？我想几千里路都走了，这离富裕不过七、八百里路，一定找下去。我们又找到富裕县，才打听到一些情况，可是因为当时的老同志都不在本县了，才找到市里来。”接着她问我：“我爸爸是什么病死的？哪年死的？埋在哪儿了？”我接着介绍说：“周建农同志到富裕县前是洮河县城区区委书记，他领导全区人民进行剿匪、反霸斗争很勇敢，受到西满军区的通报表扬。在一九四八年一月间，调到富裕县任县长，当时我和几个同志到宁安站去接他（当时富裕县城在现在富路乡），见到这位周县长只身一人，风尘扑扑，穿一套供给制的棉衣，背个行李，手拎个背包走下火车，我们急忙帮他拿着行李，坐上马车

回到县城。周县长的作风很民主，开会或研究问题，他都是耐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再做结论。他工作很深入实际，除了开会县城外，多数时间是深入到各区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工作。所以周县长到富裕县虽然时间不长，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都说周县长是个老八路，和蔼可亲。富裕县因一九四七年降雨过多，有几个区遭到严重内涝，给一九四八年的春耕生产带来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共县委书记李舒、县长周建农各带工作组到灾区做调查，寻找群众生产自救办法。我随李舒同志到五区，周县长他们到二区。一天晚上十点多钟，接到县里来的电话，说周县长逝世了。我们感到很突然，连夜赶回县城，马上找人了解周县长死的情况和原因。原来周县长在当天四点钟左右回到县城的，他感到很疲劳，通讯员为他烧好浴池。吃完饭就去洗澡，约一小時左右，通讯员不见周县长出来，就走到浴池门外听听，里边没有洗澡的声音，敲敲门也没有回音，因里边插着门也拉不开，他马上找县政府秘书庞华，庞华到后将门撬开，见周县长的头浸在水里，早已断气了。经医生检查，认为是积劳成疾，身体衰弱，心脏病突然发作致死的。县委用电话向地委做了报告，并为周县长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周县长的灵柩运至齐齐哈尔市，安葬在龙沙公园内，同烈士马识途、王大化等并葬在一起，墓前树立“富裕县长周建农之墓”的石碑。后来建成西满烈士陵园，周建农等陵墓葬在西满烈士陵园里。

在民政部门的协助下，由地委副书记巴凤等陪同梅家三代人到西满烈士陵园瞻仰周建农同志墓，举行了祭奠仪式，

墓的周围摆上青松，墓前摆着中共嫩江地委，中共齐齐哈尔市委献的花圈，周建农的妹妹和女儿梅燕抬着花圈缓步敬献在墓前。地委巴书记致了悼词，梅燕一字一泪的致了祭文：爸爸，您未见过面的女儿，今天来祭奠您，望爸爸的英灵看一看您的女儿吧！爸爸，三十多年来，女儿朝思暮想，寻遍了天涯海角，千里迢迢，今天总算找到了您，完成了女儿的夙愿，完成了母亲的遗愿，也完成了老祖母的嘱托。爸爸，你是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死的，党和人民给了您很高的荣誉，女儿为能有您这样的爸爸面骄傲，您未完成的事业由女儿来继承，望爸爸为祖国的振兴而欣慰吧！



伪满兴农合作社与粮谷出荷

郑化宇

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为继续推行其扩大侵略战争，加紧对东北的资源进行残酷地掠夺，首先在施行粮谷统制方面开始，把人民赖以生存的命脉，紧紧握在手中，藉以控制东北各族人民反满抗日的情绪与活动。大同二年（1933年），在全东北成立了“农事合作社”。其机构中设有信用系，主管农贷；设有农事系，主管农业指导。表面看都有扶持粮食生产与发展的一面，但实际是为了更多的榨取农民所生产的粮食，采取“养鸡取蛋”的手段罢了。

“农事合作社”（1940年改为“兴农合作社”）主要是执行伪满颁布的“粮谷统制法”，凡是农民生产的粮食，必须到粮谷交易场，按指定的价格出售，不得私下交易。城镇人口的口粮，也得经县公署下达指标，由粮谷交易场拨到配给店去买，它的全部职能是粮食收购、贩卖、调配、储运、保管等业务，相当于现在的粮食公司职能。

一九四〇年，“农事合作社”改称“兴农合作社”，设有总社和支社。总社设在县城，支社设在宁年。县总社位于今富路镇冰棍厂院内，建有七间土盖砖墙的办公室。粮谷交易场，在今富路镇农机二厂院内，建有五间土盖砖墙的办公

室和九间仓库与宿舍。

总社编制与机构人员是：

理事长：大田（日本人）

理 事：平岛（日本人）

干 事：姚玉书、姜新三。

下设五个系（系等于现在的股级）

经理系，主管财会，设司事主任一人，司事补系长一人，雇员四人。

信用系，主管农贷，设司事主任一人，司事补系长一人，雇员三人。

购买系，主管配给，设司事补系长一人，雇员三人。

贩卖系，主管粮食收购、贩卖、保管等业务。其下设粮谷交易场，设司事补系长一人，雇员三人。

农事系，主管农业生产指导，设司事补系长一人，雇员三人。

庶务系，主管社内事务、后勤，设司事补系长一人，雇员三人。

宁年支社：

宁年支社社址位于现富裕镇一百院内，建有五间土盖砖墙的办公室。粮谷交易场位于今龙江剧团附近。当时的机构与编制是：

主事：松泽（日本人）

购买，司事补一人，雇员一人。

贩卖，司事补一人，雇员一人。

粮谷检查，司事补一人，雇员一人。

交易场，司事补一人，雇员一人。

伪满康德十一年（1944），兴农合作社的机构、编制人员如下：

理事长：大田（日本人）

理事：宫泽（日本人）

理事：董兰亭

主事：张观翥

经理系长潘希圣，司事补张德林，雇员3人。

信用系长陈洪阁，雇员3人。

购买系长李锡山，司事补，雇员2人。

贩卖系长×××，雇员7人。

农事系长杨忠民，雇员2人。

庶务系长董太厚。

伪满康德十一年（1944），我县伪兴农合作社宁年支社的机构、编制、人员如下：

主事：松泽、松尾（均日本人）

司事补：小井手（日本人）

司事补：庞世园、孙云峰、姜新二、杨风令

雇员12人，临时雇员4人。

伪兴农合作社有两项重点工作：

一是春种时农事系人员下到村屯，调查播种面积数量与作物品种，制表造册，上报县公署，做为粮食出荷数量的依据和参照。

二是粮谷交易场是搜刮榨取农民粮食统制场所，农民卖粮要经过排队、化验、定等、划价、检斤、入库、领款、领

配给品等众多关卡。主办人员乘机敲诈勒索，压等、多扣，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年代里，农民不敢怒也不敢言，只好把辛酸的泪水咽到肚子里。而在他们部分人当中，却乘机和大地主、大粮户互相勾结，采取开空头票顶出荷粮办法，饱私获利，如郝玉芳就是因内部分赃不均，事情败露被判了刑，蹲监坐狱，成为一时的丑闻。

日寇为掠夺更多的粮食，规定按出荷粮给配给品，规定卖100斤粮配给十二尺平纹布、一两线，可是就这么少量的布、线，多数也被伪村保甲长私吞了。土改时，二区席保长一次坦白了他私吞配给的布四百八十多尺，可见一斑。

兴农合作社，所购入粮食，除少部分供城市口粮，全部卖给“日清”、“三泰”、“三井”等日本商社，运往日本，成了日寇进行侵略战争的得力工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节节败退，南方粮源的海上运输通道，全被美海、空军切断，日本本土粮食奇缺，施行定量配给制，达到了吃粮、豆、薯、菜混食地步。因此对东北粮食更加疯狂的掠夺。据伪龙江省实业厅档案记载“每垧地粮谷出荷量在100—800公斤”当时我县人口约35,600人，耕地面积33,821垧，每年出荷粮在13,408,400—27,056,800公斤，人均达700多公斤，此外还要大量的“报国粮”。因此农民所产粮食已剩无几了，只好以糠菜代食，过着悲惨的日子。

伪满时期，人们一听到“粮谷出荷”这句话，真是不寒而栗，惶恐交加。每年新粮一上场，便由伪县长、日人副县长为首的出荷督导班，由伪科、股长，伪村长编成的“出荷

工作班”，由警察署长、特务、警察组成的“粮谷搜查班”，倾巢出动，下到村屯，夜以继日的轮番索要，甚至翻箱倒柜，扒炕掘壕。福合警察署警尉补王金环，所到之处令农民把场院壕沟都挖一遍，警务科的口人高桥到新民村，由东到西把柴禾垛大翻个。到了一月，出荷粮没交完，又要“报国粮”，拿不出就吊打非刑，上大挂，灌凉水，警尉补王金环在龙水泉西屯令十余人面对墙跪着，用大皮鞋踢头往墙上撞。兴杨镇警察署长高国相，令警尉补郭国琛，把无粮可交的农民杨子珍、杨华丰，用皮鞭沾凉水毒打，打的死去活来，没过三天就被逼死。至于被逼上吊、跳井、家破人亡的到处可闻，构成一幅人间地狱的悲惨景象。

物换星移，如今已是半个世纪过去了，“前师之事，后事不忘”。我们要教育子孙，牢记教训，决不许历史重演。全国一心，众志成城，把我们可爱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